都是一脉相承的，表面上好象是为了扩大贸易，没有领土野心，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侵略的基地。例如，从威忒到喀塞卡特等人，都建议英国政府夺取海南岛为属地，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侵犯台湾，依据舟山为基地等，都与明清以来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分不开。

清代人口研究述评

高　王　凌

最近几年，由于对我国人口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因而在历史研究方面，对人口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逐步开展起来。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增加最多最快的时期，它直接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础。有清一代，人口因素又与皇朝的兴衰密切相关，它在清代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史中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清代人口研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近几年中（1978—1982年），关于清代人口问题共发表有几十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清代的人口思想、清代人口的增长及其数量的估计、人口问题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对策等许多方面。以下仅就所见，分题介绍，间及一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清代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在这方面，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较早较多地受到人们的注意，例如洪氏对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增加的看法和忧虑，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思想。近几年中，研究的一个侧重点表现在对洪氏思想评价的转变上，这可以从胡寄窗两篇文章（《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十五章二节；《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的对比中看出部分，李世平文的标题《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吗？》（《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也反映了这种趋向。洪亮吉之外，还有文章讨论了汪士锋、薛福成的人口思想，指出其中也有很应重视的一些方面。然而，对于清政府特别是康熙皇帝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出发，那些对清代历史特别是经济史的实际运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事，必然会引起更大注意；从1981年初以后，像洪亮吉人口思想一类的文章已不多见，而让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

二、关于清初丁口统计对象问题：在清代官方统计中，清初顺、康、雍三朝的“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万左右，到雍正末年才达到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朝和乾隆以后，“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而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突破了两亿，以后又进而达到三亿、四亿，远迈历代，并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础。这中间（从康、雍年间到乾隆初年）是有着一个“飞跃”么？这样的“陡增”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长时期中，有不少学者混同了前后两种统计对象，对这一“陡增”迷惑不解；也有人把清初编审对象问题做为尚未解决的“悬案”（详见马小鹤《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1979年）指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是不同的。尤应指出，该文所提到的孙毓棠《清代的丁口纪录及其调查制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六卷二期，1950年），已对这些问题做过详明的阐释。

清代顺、康、雍三朝与乾隆以后人口统计的对象既然不同，这中间也就不存在什么“飞跃”,乾隆及其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就不是“突然”而不好理解的了。那么，应当如何估算只有人丁而无人口记录的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呢？

三、关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问题：前述李世平文在估算清初人口时，即以“人丁折合人口”的方法折算过顺治八年的人口数，比率是一丁折五口。马小鹤文根据现代统计中“15—6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44—65％”,估计我国清代“成丁占20％左右，即总人口约是成丁的5倍”。周源和《清初人口统计析疑》(《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为补助马文立论之“不足”,主张“从明清近六百年来户与口的一贯比例关系来求证‘丁口’与‘人口’的比数”,即以“户”代“丁”,依照“户（丁）与口常在一与五之比”的关系折算人口。他们以人丁数字乘以五，得出顺治初年有五千万人，康熙初年一亿人左右，康熙末人口约一亿二千万（参见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郭松义《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二辑，1982年）指出不应“把丁和户等同起来”,主张“从了解丁与口之间的比例入手”,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研究。他通过许多既有人丁又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方志材料，将“丁口的比例，大致定为1：4”。并算得顺治初约有四千万人，康熙初约七、八千万，康熙末人口超过一亿。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以康熙五十二年到雍正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69％）做为顺、康、雍三朝的实际年增长率，据此以雍正十二年丁数为基准重新计算三朝不同时期及乾隆六年的人丁数，再以算出的各朝“人丁‘实数’”去乘乾隆六年的丁、口比例（每丁合4.99口),于是得出各时期人口数字，如顺治初七千余万，康熙初八、九千万，康熙末一亿二千多万等。

把人口计算的基数建立在人丁编审数字及其年增长率上，会遇到因人丁编审严重不实所带来的史料如何恰当运用的问题。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对这样利用编审数字和以丁折口的方法，提出了异议。郭松义文对于人丁编审数字，特别是康熙中期到雍正初年的人丁增长率，也提出了怀疑；并认为，“不同时期，平均每丁带口数可能也会不同”,而对各时期丁口比例，实“因资料欠缺，无法进行推算”。因此，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2年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舍弃了人丁编审数字，采取利用乾隆时期人口数字和人口增长率进行前推的方法，推算康熙二十年以后到雍正年间的人口数字（如康熙二十年左右有七千多万，康熙四十五年左右超过一亿)。

对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应当受到多方面史料的检验，反过来，科学的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检验一些已有的观点。例如对清初人口数字的估计，涉及到明清之际人口减少程度的问题（当然其中也牵涉到对明末人口的估计);对康熙、雍正朝实际人口增长率的不同看法，涉及到对于康熙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地丁合一”对清代人口增长的实际作用问题，——在这许多方面，我们都可见到清代人口数字的考察，对于清史研究本身的意义。

四、清代人口问题的发现及其对于政府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第一个指出人口过剩问题的是乾嘉时人洪亮吉，这一说法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沿用。吴申元《对〈清代人口研究〉一文的两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指出，在清代以前特别是在明代，早已有人提出过“人口过剩”的概念。但在清代，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人口问题？

这种认识又在历史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程贤敏文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它认识到人口问题，也不会早于乾隆晚年。高王凌文提出，“在清代第一个指出了人口压力问题存在的，是清圣祖玄烨”。从那以后，历经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在向来的鼓励垦荒、轻徭薄赋之外，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对策，以求减轻人口的压力。这就是在“地无弃土”的情况下，展宽农业的经营方向，谋求农业的全面发展等等。在很长一个时期（尤其是在十八世纪上叶），这形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考虑焦点；它对经济的发展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人口问题对清代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影响通常表现在人平均耕地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紧张等方面。进一步说，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经营、在清代传统经济最高水平点的出现、经营方向的高度拓展等等，都与我国的人口状况大有关系。在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究竟起过何种作用，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认为，人口因素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乃至“长期停滞”，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他对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人口问题的看法，反映出他的人口问题观念。对于“长期停滞”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即使需要有所增加，也“可以用增加劳动人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去改变生产设备”，因此中国社会“不能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2年6月21日）也是着眼于研究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晁中辰《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我国清代前期由于自由“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此外，在清代人口研究中，关于地区性的人口历史、少数族人口历史、人口流迁、人口构成等方面，也发表了若干文章。

总起来说，在国内沉寂了几十年的清代人口研究，在最近几年里迅速开展起来，在上述的若干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清代人口研究毕竟是刚刚起步，它还有许多不足，例如在人口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基本史实包括有关典章制度等的掌握、包括档案、方志、族谱等在内的各方面史料的利用、对前人和海外研究成果的利用以及学术交流等等方面，都还有着不少欠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清代人口高速增长的经济成因等，也还缺少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清代人口研究势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九八一年日本研究清史概况

〔日〕浅井纪著　杨余练译　周世铮校

明清时代被称为乡绅、绅衿或绅士等阶层，怎样阐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存在的形态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现今明清史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去年发表的各种研究论著中，这个问题仍然最多。到目前为止，研究者的主要倾向，是根据不同的乡绅、绅衿、绅士的概念，用事实作出严密的规定，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强调绅和士的区别，把乡绅一